

成为知识的生产者

王正毅

现行的国际体系不仅存在着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不同,而且还存在着知识结构的差异。政治、经济结构中处于核心的国家或地区,不断通过知识的创造向国际体系推行“一元”的、“普世性”的知识;而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处于边缘的国家或地区,则不断强调文明的“多元性”和“特殊性”。

知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20世纪国际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出现的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的结构相对应,20世纪的国际体系在知识上也相应出现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的结构。所谓知识领域的核心区,主要是指那些创造概念和范畴的地区,而边缘区自然是指那些消费核心区创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的国家和地区。核心区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等方面的创造性表现在:一是立足核心区的社会现实经验提出原创性的概念和范畴;二是对边缘区的社会现实经验或进行概念、范畴的原创或进行案例证实以及证伪,并借助英语这种“国际化”语言进行推广。边缘区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消费性表现在:一是在核心区创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的框架下对自己所处的地区进行实证分析,以寻求二者的差异性和关联性;二是直接消费和借用核心区学术界创造出的关于本地区的知识。

知识的普世性与知识的特殊性。与知识结构中的核心和边缘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知识结构中的一元和多元的冲突。核心区通过原创性的概念和范畴,力图寻求一种“价值无涉”以及“普世性”的知识,并在世界经济以及霸权国家的推动下不断向全球推广这种知识。而边缘区却进入沃勒斯坦所说的“两难境地”之中:接受核心区的知识,但担心失去自己悠久的文明;不接受核心区的知识,又担心自己在知识权力结构中处于劣势。这样,“文明的多样性”以及“国际化”便成为边缘区国家经常矛盾的“文明战略”。

但也不断有“例外”出现。当19世纪的德国远落后于英国时,两位德国的思想家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当20世纪50年代拉丁美洲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时,普雷维什和桑托斯提出著名的“依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区域化的大潮中,东南亚国家提出与众不同的“东盟方式”。

正是从这种“例外”中,中国学者得到了启示。处于核心区的国家并非总是知识的生产者,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和地区也并非总是知识的消费者。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也正是因为这种“例外”的出现,中国学者们开始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以及最近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生成。

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的纯粹的理论,也没有完全脱离理论的经验现实。人们所设想的理论和现实这种二分法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世界中。事实上,任何理论,其研究议题完全来源于现实,所不同的只是人们如何对待这些现实,是偏好“分析性”的路径,还是偏好“描述性”的路径。

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好,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也罢,这不仅为中国学者的“价值偏好”所左右,而且也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所涉及的具体议事日程相关联。让我们共同努力,伴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的脚步,从问题领域入手,贡献我们的才智,成为知识的真正生产者。